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有赖沿线国家的通力合作:既离不开中国不同部门和群体间的分工与协作,也离不开相关国家在各具体领域与中国的总体衔接。本期继续重点打造“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主题文章。

吴思科在提纲挈领的《“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对接》中,尤为突出了此种战略对接的高度与广度:首先,强调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战略对接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战略具有统揽全局的高度,中国与中东国家就“一带一路”而采取的相互战略对接是关乎此倡议生命力的第一要务;其次,清晰点明了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对接的三大具体路径,即安全协作、经贸合作、人文交流。路径具有辐射范围上的广度,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安全、经贸和人文并举,这是确保此倡议持久力的重要基础。激活丝路“情结”、服务丝路“合唱”,中国在中东大有可为。涂怡超在《宗教与当前中国公共外交:理念、机制与效应》中,侧重论述了“一带一路”战略对接路径中的人文交流之路,特别是宗教对中国公共外交的参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其结论是:中国将宗教因素纳入公共外交,既是来自中国历史实践的成功经验,亦是新时期达成整体外交目标的必经之路,这在面向中东伊斯兰地区时更是关键。全菲的《科威特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的倡议》,选取胸怀强烈丝路“情结”的科威特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研究案例,这涉及“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中的经贸合作路径。深受海湾战争影响的科威特意图恢复昔日中东金融和贸易中心地位之梦为实现中科经贸合作共赢提供了坚实基础。该组论文在领域和国别的案例选择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中东地区内外因素对“一带一路”战略合作的影响依旧,这包括中东内部的机制困境,也包括域外大国内部的伊斯兰问题,这分别构成了本期另两组的专题论文“中东热点”和“西方与伊斯兰”。姜明新的《世界经济变化对中东经济的影响》、范鸿达的《埃及“1·25革命”与伊朗伊斯兰革命之比较》和雷昌伟的《王室权力机制与沙特政权之稳定》,分别从中东地区整体经济状况、埃及政治动荡和沙特王室纷争入手,展现了中东国家内部治理中出现的“阵痛”。李宁的《“伊斯兰国”影响下的西方青年极端化现象分析》和杨忠东的《西方穆斯林的社会整合研究》,分别从西方外部的“伊斯兰国”影响因素和西方社会内部的社会整合困境出发,论述了西方穆斯林群体因其社会参与度低而更易受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蛊惑,“伊斯兰国”的负面效应实际上已经外溢至中东地区以外的诸多国家。